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一

夏商周考古探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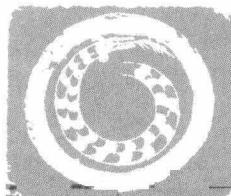
刘 絮 著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一

夏商周考古探研

刘 绪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考古探研 / 刘绪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8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03-041464-9

I . ①夏… II . ①刘… III . ①夏文化（考古）—研究 ②商周考古—研究 IV . ①K871.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251号

责任编辑：李 茜 / 责任校对：鲁 素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8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 1/4

字数：602 000

定价：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31

Selected Essays on the Archaeology of Xia, Shang and Zhou

Liu Xu



Science Press
Beijing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邦维 李伯谦 宋豫秦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常务） 高崇文
郭之虞 程郁缀 赵化成 赵 辉
严文明

序

李伯谦

大家期盼已久的刘绪教授《夏商周考古探研》一书即将面世，这是学界同仁和广大夏商周考古爱好者值得高兴的事。

刘绪先生是山西广灵人，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后更名考古研究所）工作，曾担任副队长。1980年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随邹衡先生攻读夏商周考古，1983年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他业务基础好，平时又刻苦好学，虚心向老师、同学学习，深得邹先生真传。他不仅在考古知识、技能、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大提高，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做学问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作风，也都能看到邹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刘绪先生在夏商周考古领域默默耕耘，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我们看他收入该书的论文便会知道，几乎在所有重大学术问题上，他都有深刻地分析和真知灼见。过去，是单篇单篇地看，这个感觉还不突出，现在放在一起集中阅读，便强烈感到他对夏商周考古的认识，不仅深刻，而且系统全面，仿佛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他把收入该书的37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在“夏文化研究”部分有7篇文章，从早期夏文化到夏商分界、从夏文化的年代到类型划分、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关系到性质的判断均有涉及。其中由硕士论文补充修改完成的《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最见功力，该文通过对自己亲自调查发掘的典型遗址的地层、分期、特征、相互关系的分析，将卫怀地区的夏代遗存分别以北平皋—赵庄遗址、李固—潞王坟遗址为代表，分为沁河以西、以东两类遗存，继而通过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比较，判定沁河以西的以北平皋—赵庄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属二里头夏文化，沁河以东的以李固—潞王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属早于二里冈早商文化的先商文化。其分析之深刻，论证之严密，所作论断之无懈可击，堪称考古学论文之典范。继该文之后提出的《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在该文基础上着重从墓葬随葬陶器着眼，比较两者的异同，以丰富的材料证明两者在器物组合、造型与纹饰特征诸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同样反映在遗址出土陶器上，从而使最早由邹衡先生提出、他在上文中继续论证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冈文化是早商文化的论断，更加具有说服力，并且成为了迄今大家仍在沿用的判断新发现的遗存何者属二里头夏文化、何者属二里冈早商文化的标准。

在“商文化研究”部分，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商文化的起源、商文化向周边的拓展、商文化分布的四至、商族先公的迁徙、河亶甲居相的推断……，均有涉及，但重点则是夏商分界、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关系。熟习夏、商考古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初郑州洛达庙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相继发现和发掘起，夏、商分界问题就提出来了。近60年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四期前、后段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冈下层一期之间，各种可能性都提了出来。但不可否认，随着讨论的深入，焦点基本上集中在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四期前、后段之间，还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冈下层一期之间，夏商分界的标志是只有偃师商城的始建，还是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个商城的始建上了。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刘绪写出了《早商都邑比较之一——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与偃师商城第一期遗存比较》一文，先刊登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编的内部交流刊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56期（2013年），不久，又正式刊发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该文针对主张偃师商城始建于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同时的偃师商城分期的第一期第1段的观点，搜遍已发表的偃师商城的资料，除“大灰沟”最底层很少一点堆积，在宫城、宫殿基址、府库、铸铜作坊、墓葬等可见的遗存中，没有任何可早到第一期第1段者。因此他作出结论说：“我以为，仅依靠‘大灰沟’底部的一点遗存，就断定此时汤毫建成，实在太过大胆。”以此文为基础，他又将《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毫的若干问题》《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等相关论著中的观点加以整合，在2013年10月28日于偃师市召开的“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这类观点的主张者发出了“八问”的挑战，从《困惑八问——向偃师商城西毫说求解》发出，半年多过去了，但至今尚未看到有谁出来应答。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对偃师商城可能即为史书上所称的西毫的说法不持异议，但在其始建年代和性质上，我基本和刘文的看法一致，即偃师商城晚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早不到偃师商城分期的第一期第1段、偃师商城不是早商时期的主都。如果说在材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存在争议不足为奇。那么，在资料翔实、介绍客观的《偃师商城》考古发掘报告刊布之后，对此已经没有继续讨论的余地，是该适时做出结论了。商代考古，都邑无疑是重中之重，继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洹北商城的发现自然会引起大家格外的重视。在围绕洹北商城的讨论中，多数意见主张其为盘庚所迁之殷，而发现洹北商城的消息披露伊始，刘绪和雷兴山合写的《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一文则率先提出其最大可能是河亶甲的相都。我一开始即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2012年12月我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五十五期上发表的《商王朝考古编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再次在他们所作论断基础上进行了论证，特地指出，多数学者都比较采信的《古本竹书纪年》，明言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洹北商城如是盘庚所迁之殷，就很难解释四周城墙还未彻底建好，为什么到武丁时便废弃不用迁到了一河之隔的洹河以南？当然，洹北商城的

考古工作还在继续，前些年发掘的资料尚未全部公布，和偃师商城不同，学术界对其年代和其为何王所都还有讨论的空间。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篇文字并不很多的小文，是想强调刘绪在学术研究中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新解的精神和勇气，因为在科学的研究中，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周文化研究部分，和夏、商文化研究一样，同样是围绕重要的新发现展开的。也许是为学生讲课的需要，刘绪先生对每年新发现材料的熟习，可谓如数家珍。他发表的《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列出了西周墓地（墓葬）10处、东周墓地（墓葬）9处，涉及墓葬数千座，引用文献96篇。这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统计，因为他既要述又要评，如果没有认真地对文献的阅读、分析和比较，是很难评出一个所以然的。周文化研究部分，选出文章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研究重点则是刘绪先生参加过多年发掘的山西曲沃、翼城两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及晋侯墓地，北京房山董家林燕都遗址和陕西周原及周公庙遗址。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及晋侯墓地，刘绪是邹衡先生主编的《天马—曲村》大型考古报告居址部分的整理者和执笔者，是晋侯墓地M1、M2组及M64等晋侯或晋侯夫人墓的发掘主持者、报告编写者。他一边发掘，一边整理，一边思考，除编写了《晋文化》之外，还先后写出（或与他人合作写出）了《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晋侯邦父墓与楚公逆编钟》《晋国始封地与早期晋都》等，涵盖了年代分期、文化特征、始封与都城迁徙、墓主推定、墓葬制度、器铭考释等方方面面。我1979年随邹衡先生到曲村，随后刘绪投考邹先生研究生也来到曲村，从1980年开始直到2000年田野工作结束，中间断断续续，是我和刘绪先生共同在野外工作最长的地方，我深知他的用功，深知他发掘技术的熟练和观察与分析问题的敏锐与深刻。他的这些文章皆是从材料出发，皆是潜心思考的结晶，在不少问题上，例如叔虞始封地望的推求、晋侯墓地分期的分析、楚公逆钟铭文的考证等，对我都有启发。当然，限于材料之多寡和出土之早晚，有些观点前后略有调整甚至差异，这并不奇怪，我们读这些文章，关键是要弄清其思路之变化和最终结论得出之过程，从中悟到研究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关于以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燕都为中心的研究，因刘绪先生现在的精力主要放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琉璃河董家林燕都城址发掘报告的编写上，发表的论文不算多，但他与赵福生合写的《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和《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两篇文章，对燕文化研究来说都相当重要。前者在对燕都遗址分期基础上，将其文化内涵分为周文化系统、商文化系统和土著文化系统，认为“既然三者同时存在于西周燕国都城，当然都属燕文化，而不能把任何一种因素排除在燕文化之外”，并指出至西周晚期，“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远不像早期那样容易区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文化特征，这当是各类文化因素长期融合的结果”。燕国是西周初年众多封国之一，这一论断的得出，对于正确分析和认识其他周初封国尤其是东土封国文化

有重要启示意义。后一篇专谈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的文章，和我对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意见相左，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的文章，认为周初召公封燕到达燕地时遇到的土著文化即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燕文化对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吸纳融合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直到西周中后期才推进到琉璃河燕都70多千米以外包括今天津蓟县在内的地区。当时对这些看法颇为自信，但看过刘绪先生和赵福生先生合写的这篇文章后，慢慢琢磨才发现，我注意的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正像他们合写的另一篇《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一文已经说过的那样，西周早期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以叠唇高领僵直绳纹鬲为代表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及以折沿袋足粗绳纹鬲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都已是西周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京津相当大范围内这类遗址多有发现，已不能将之排除在西周燕文化之外，这就使我必须重新思考原来的观点究竟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至于张家园上层类型与围坊三期文化的关系，当然也是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的问题。学术上出现不同观点是正常现象，我和同行交往，包括刘绪先生在内，听到不同观点，尤其是针对自己的观点，非但没有埋怨，反而觉得愉快，我感觉好像在自己脑子迟钝、懈怠时，突然被打了一针激素、一针强心剂，激活了自己的思考力，使自己重新获得灵感和继续探索的勇气。

周原是周民族隆兴之地，周原和周公庙遗址在商周考古上的重要性较晋都、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绪先生最值得欣慰的在自己田野考古生涯最辉煌的阶段是在这两个地点度过的。在这里，他和在曲村、在琉璃河一样，同参加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培训班学员朝夕相处，言传身教，既尽到了一名教师培养学生的职责，也围绕这两处遗址和周文化研究，思考了许多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发表了《西周西土的考古学初探》和《周原考古札记四则》两篇作品。在《西周西土的考古学初探》一文中，他根据考古发现探讨了西周西土的范围，梳理了周人西土观念的变化，考察了西土外围考古学文化的状况和周、秦文化关系的发展以及向东的开拓和诸侯国的分封，明确指出：“西周王朝在倾力统治东方的同时，对其大后方——西土地区的统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没有加强防范。这一治国方略的失误，对西周的衰亡产生了作用，至少它是西周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周原考古札记四则》是刘绪先生在周原考古工地边思考边写下的，在文中谈的四个问题：一是何种遗存是周原遗址的先周文化，二是周原遗址揭出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形制分类及其性质的分析，三是以宽沿方唇分裆无实足根鬲和侈口方唇矮圈足簋为代表的商式陶器的年代和性质，四是乳状袋足鬲和联裆横绳纹鬲的年代下限和与其同时的甲骨文、铸铜遗址等能否晚到西周早期。这四个问题均是当前周原考古最热门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对一、三两个问题，刘文有明确的表态，即周原殷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两期五段分期的第二期第2、3、4段以高领袋足鬲为重要特征的遗存为先周文化，以宽沿方唇分裆无实足根鬲和侈口方唇矮圈足簋为代表的商式陶器的出现是进入西周早期的标志。而对二、四两个问题即大型建筑基址和乳状袋足鬲、联裆横绳纹鬲的时代只做了客观的介绍，并未作

出肯定的论断，反映出谨慎的态度。应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周原考古的新进展，没有长期周原考古的实践和思考是想不到也提不出来的。但同时也表明，周原的问题十分复杂，在许多问题上似乎尚未形成趋同的意见。不过循着刘文的思路，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和综合研究，加强探索的广度和力度，这些问题解决的途径、方法将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刘绪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广，在除上述之外的其他部分，我特别希望大家看一看《田野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和《春秋时期丧葬制度中的葬月与葬日》两篇文章。《田野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虽然是田野考古中习见的发掘区如何划分、探方如何编号、地层及遗迹如何编号、基点及基线如何设置、深度与厚度如何测量等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但现实状况是各行其是，远未统一。田野考古的水平决定着考古研究质量的高低，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涉及新的科技手段、方法的采用等许多方面，但基础的则是田野考古的规范，而规范首先就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刘文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不是长期在野外摸爬滚打的人不会想到写这方面的东西。《春秋时期丧葬制度中的葬月与葬日》，是根据《春秋》及三传、三礼和《汉书》等文献的有关记载，对古代丧葬制度中一个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古代的丧葬制度，但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就必须与文献的研究相结合。我之所以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一个考古工作者要重视文献，要从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分析问题，不能老停留在考古是考古，文献是文献，两者互不相涉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讲，刘绪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这部论文集是刘绪先生自己学术研究的结晶，也是献给夏商周考古领域同行们一份厚重的礼物，在它即将出版之际，是要特别向刘绪先生说声感谢的！

2014年6月10日

目 录

序	李伯谦 (i)
夏文化研究	
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	(3)
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	(42)
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兼谈二里头文化的性质	(52)
东下冯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58)
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	(65)
对探讨早期夏文化的几点看法	(67)
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	(76)
商文化研究	
早商文化的考古学横向观察	(85)
关于西毫说的几个问题	(90)
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兼答方酉生先生	(95)
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	(106)
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毫的若干问题	(126)
夏末商初都邑分析之一——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比较	(143)
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	(168)
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	(177)
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	(184)
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	(195)
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	(203)
昭明之居与元氏铜器	(211)
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	(213)

两周文化研究

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	(219)
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	(224)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	(234)
晋侯邦父墓与楚公逆编钟	(245)
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	(248)
晋国始封地与早期晋都	(255)
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	(265)
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	(275)
周原考古札记四则	(282)
西周西土的考古学初探	(291)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浅谈	(301)
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	(305)
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	(312)

其他

春秋时期丧葬制度中的葬月与葬日	(337)
先秦的车舆	(352)
夏商周陶瓷发展史初论	(357)
田野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387)
后记	(397)

夏文化研究

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

一、绪 言

卫怀地区在河南省北部，包括清代的卫辉府和怀庆府。《禹贡》为冀州覃怀之地，商代为畿内之域，两周近于洛邑王城，先后为周、晋、郑、魏所有。秦属三川，汉属河内，其后或属怀或属汲，通常称为河内。现在属新乡地区。

本地区是中原腹地的一部分，西北靠近太行山，与山西垣曲、阳城、晋城、陵川诸县接壤，南部隔着黄河、邙山，与洛阳、郑州、开封等地相邻，东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境内有两条主要河流：沁水从晋东南穿太行山，经济源、沁阳、温县、武陟注入黄河，把本地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卫水自清化（博爱）发源，经焦作、修武、获嘉、汲县进入安阳地区，后与漳河合流。据古文献记载，此地既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夏人势力所到之处，著名的羊肠、河济就在这里。

卫怀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早，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温县、获嘉、辉县等地进行过调查^①，并于1935~1937年在辉县发掘了一些商至汉代的墓葬^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各级文物部门又先后在辉县琉璃阁^③、新乡潞王坟^④、济源原城、沁阳圪垱坡^⑤和孟县东杨^⑥等遗址进行了发掘。但过去的这些工作，所获资料有限，不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和探讨其与邻近地区诸文化的关系。1981年秋冬，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七、七八级部分学生在新乡地区试掘了修武李固、武陟赵庄和温县北平皋三处遗址^⑦，并在这三个县，以及沁阳、辉县、原阳等县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上自龙山文化，下迄商周时期的遗存，其中，尤以晚于龙山文化而又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遗存最为重要。据初步研究，卫怀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显然可以分为两类，而对这两类遗存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它与周围各地区诸文化的关系，并进一步辨别夏、商两种文化的面貌。

①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4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中国科学院：《辉县发掘报告》1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③ 中国科学院：《辉县发掘报告》15、31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⑤ 河南省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新乡地区历史文物介绍》，1981年编印。

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考古》1983年第2期。东杨遗址位于黄河以北，原属孟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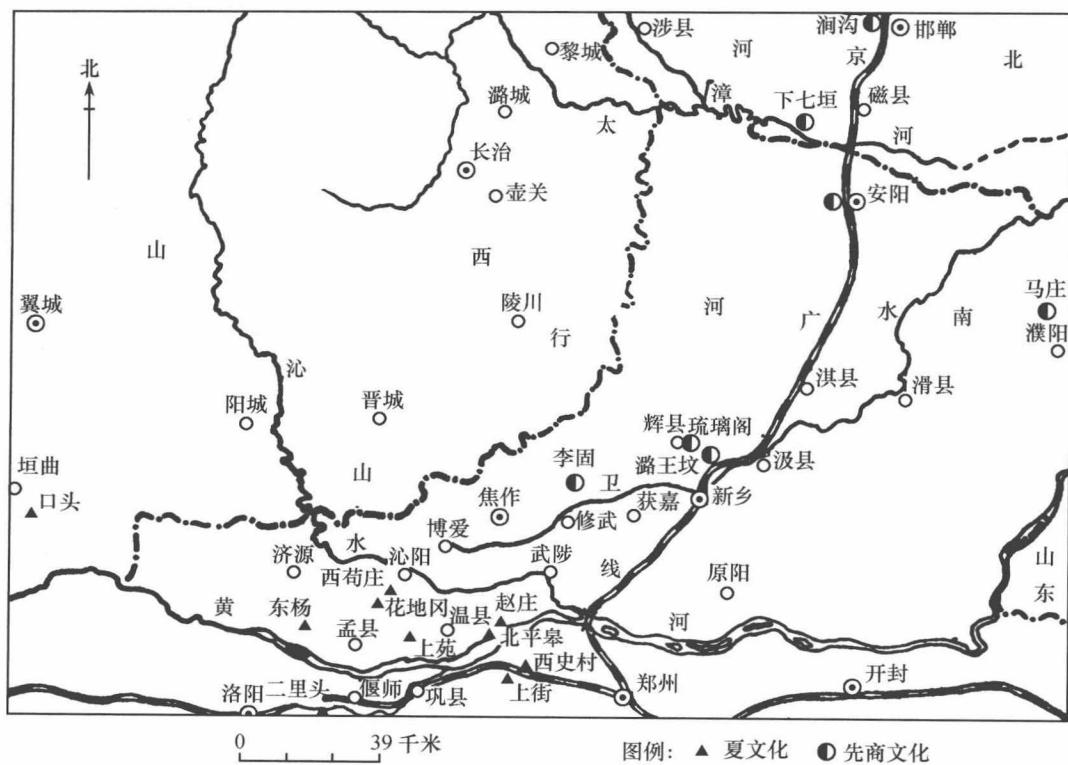
⑦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二、卫怀地区夏商文化的年代分期和文化特征

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如果以晚于龙山文化而又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遗存为主要标准^①，则可以沁水为界分为两类：沁水以西为一类，以北平皋—赵庄遗存为代表；沁水以东为一类，以李固—潞王坟遗存为代表。

(一) 沁水以西的北平皋—赵庄遗址

北平皋和赵庄遗址分属于温县和武陟县，两遗址相距3千米，济水从其间流过。它们均位于沁水西南、黄河北岸的清风岭上，南面隔河与郑州上街、西史村遗址相望。据笔者调查，沁水以西晚于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冈期文化的遗址还见于温县安乐寨上苑，沁阳县崇义公社西苟庄、范村花地冈等地，孟县吉利东杨也属这类遗址（图一）。



图一 卫怀地区夏文化、先商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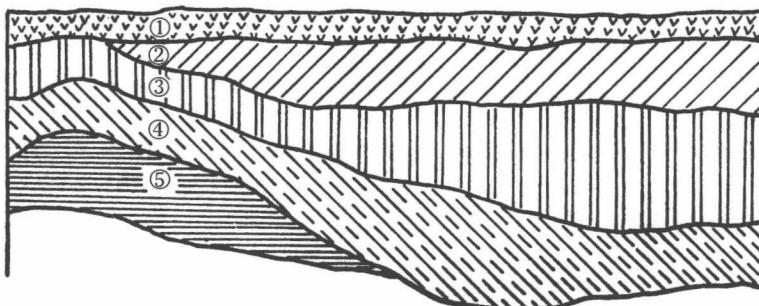
^① 近年来的夏商文化讨论，涉及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冈期文化各个阶段。由于卫怀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资料很少，目前难以详论。

1. 地层与分期

(1) 赵庄遗址

赵庄遗址范围颇大，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500米，堆积一般厚约2米。包含有仰韶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和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也包含有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最后一类文化遗存和二里冈期商文化遗存分布在遗址西南部，紧邻黄河大堤，部分已被河水吞没。

据1981年的发掘，赵庄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有二组，其中探沟81WZTG1的地层如图二所示。



图二 81WZTG1南壁局部剖面图（赵庄）

第1层：农耕土。

第2层：灰黄色土。出有战国、汉代陶片。

第3层：浅灰色土，质较松软。内含丰富，出有粗绳纹鬲、甗、罐，还有长颈大口尊、簋、豆、小口瓮、钵、甑、敛口瓮、器盖以及石、骨器等遗物。以鬲和大口尊最多。其特征与二里冈C1H1者接近^①。

第4层：深灰色土，质较松散。出有细绳纹薄胎鬲、甗、罐，还有盆、大口尊以及少量石器和龟甲。从出土陶器看，如鬲，卷沿尖圆唇，锥足瘦长，胎甚薄，饰细绳纹，与二里冈C1H17所出者相近^②。

第5层：黑黄杂花土，质较硬。主要出有夹砂罐、泥质罐、口径稍大于肩径的大口尊、附鸡冠状钮的深腹盆、小口瓮等。

另外，断面D2和D4下层所出遗物特征也和G1⑤者相同。

(2) 北平皋遗址

北平皋遗址以东周和汉代遗存最为丰富，此外，还有少量仰韶晚期、西周晚期和文化特征与赵庄G1⑤者相同的遗存。最后一种遗存主要分布在北平皋古城城内的南部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图壹：9（C1 H1 : 20）等，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I期。